

## 〈論說〉

# 文成公主的身世、年齡、 婚嫁及在藏生活时间初探

胡 晓 兵\*

文成公主(?-约680),是唐代第一位远嫁吐蕃赞普的中原女子。但是,自唐以来的一千多年里,人们还不能确知关于文成公主身世、年龄、生活等等基本信息。其关键原因是“文成公主,宗室女”,<sup>1</sup>因而不能列入诸如正史《公主列传》等,所以人们对她知之甚少。但是,文成公主作为重要的历史人物,不能较为完整地对她“叙一人之始末”“叙一事之始末”,<sup>2</sup>就无法较好地还原她的生平,从而无法较好地理解她一生奉献雪域高原、泽被藏族人民的历史贡献。

因此,本文拟就文成公主的有关基本信息作一初步探讨,以期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提供参考。

## 一、文成公主的身世

文成公主是李唐王朝的皇室宗亲,而非皇帝的亲生女儿或亲姊妹。但文成公主是何人之女呢?

---

\* 本文2022年度为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センター(ICCS)若手研究者研究助成(爱IC第3号)阶段性成果。

1 (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2月,第750页。

2 (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6月,第821页。

(一) 文成公主是李道宗之女。王忠先生在1961年撰著的《松赞干布传》一书中,较早提出“(文成)公主似即其(李道宗)女”的说法,<sup>3</sup>但未加详明理由。李道宗(600-653年)系唐高祖李渊堂侄,年少即与唐太宗李世民平定刘武周、王世充等割据势力,又在西灭吐谷浑、北击突厥、东征高丽等立下汗马功劳,最后官至正二品的礼部尚书。公元641年又奉命护送文成公主和亲吐蕃。以后的研究也多因此认为文成公主是李道宗的女儿。

王尧先生对此作了略加推测,“以当日情理度之,文成公主或系道宗之女”。<sup>4</sup>不惟如此,翦伯赞先生、王钟翰先生可能也偏向于这一看法,“赞普是等到了,并且恭恭敬敬以女婿的身份接待了江夏王李道宗”,<sup>5</sup>“松赞干布也从吐蕃远道赶来柏海迎接,并以子婿之礼与李道宗相见”。<sup>6</sup>应该说王尧先生是偏向于赞同王忠先生的观点。

时隔多年,胡戟先生、齐茂椿先生在2006年撰著的《重走唐蕃古道:接文成公主回娘家》一书中,对此又两次提出了“一些猜测”,猜测之一:“有说是江夏王李道宗之女,此说因李道宗以王爷之尊领了送文成公主去西藏的差事,松赞干布与他相见时‘执子婿之礼甚恭’,让更多人相信他才是公主的生父”。胡戟先生又指出李道宗的首要政治身份是持节者,因此“李道宗是个使臣的身份,他见藏王按说应该恭敬地行君臣之礼,表示尊重才是。可反而是松赞干布以一国之君之尊,见李道宗时‘执子婿之礼甚恭’,不免让人猜测,这位王爷是公主的生父。为表示对公主的尊重,他恭敬地行大礼、拜高堂”。<sup>7</sup>也就是说,子婿之礼,成为人们判断文成公主是否系李道宗之女的困惑所在。

(二) 文成公主非李道宗之女。王双怀先生并不赞同类似的说法。他认

---

3 王忠著:《松赞干布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12月,第34页(页下注①)。

4 王尧著:《吐蕃金石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10月,第45页。

5 翦伯赞:《文成公主说了话》,《北京日报》1960年1月1日。

6 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概要》,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5月,第519页。

7 胡戟、齐茂椿著:《重走唐蕃古道:接文成公主回娘家》,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第4、25页。

为，仅仅依据两《唐书》《册府元龟》等唐史记载松赞干布迎亲河源，见到李道宗时执子婿之礼，就判断文成公主是李道宗的女儿，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因为“文成公主是以太宗女儿的名义出嫁的，李道宗持节送亲，代表皇帝，故弄赞（松赞干布）见到道宗，自然要行‘子婿之礼’”。<sup>8</sup>

这个论点是有案可资的。例如，公元758年（乾元元年）七月，唐肃宗命汉中王李瑀、司勋员外郎鲜于叔明二人，持节护送宁国公主和亲回纥毘伽阙可汗。至回纥牙帐时，自恃强大而傲慢，逼迫唐使不拜不见，“可汗曰：‘我与天可汗两国之君，君臣有礼，何得不拜’？瑀与叔明对曰：‘向者唐与诸国为婚，皆以宗室女为公主。今天子以可汗有功，自以所生女妻可汗。恩礼至重，可汗奈何以子婿傲妇翁，坐榻上册命邪’！可汗改容，起受册命。明日，立公主为可敦，举国皆喜”。<sup>9</sup>毘伽阙可汗是想偷换概念，意在君臣之仪、子婿之礼两者间取便，拙劣表演被识破后羞愧难当，只好立马承认了子婿关系，起受册命。

因此，从国家和民族的角度看，王双怀先生关于文成公主是以唐太宗女儿的名义出嫁、代表唐朝的说法，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古代帝王向以“家天下”行事，家国一体、公私无分。如果按照王双怀先生的观点，胡戟先生大概认为松赞干布大可不必行子婿之礼。此说最有力的直接证据，正如《资治通鉴》所记“赞普大喜，见道宗，尽子婿礼”。<sup>10</sup>看来，纠缠于文字记载已难有解。实际上君臣之仪、子婿之礼的转换问题，才是理解的关键。

（三）关于文成公主和亲时的礼仪争论。林冠群先生的研究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视角。林先生在深入分析唐蕃舅甥的形成变化和内涵外延关系后，明确结论“于文成公主出降之时，吐蕃确实认知李唐居于岳父之位置，是为尊

---

8 王双怀、周佳荣：《论唐代的和亲公主》，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八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1月，第180-210页（尾注61）。

9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第八册）》，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6月，第7059页。

10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第十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6月，第6164-6165页。

位，吐蕃为女婿，居于卑位”，至金城公主入蕃和亲后，吐蕃认为双方是妻兄和妹夫的平等关系，不过“李唐皇帝终究为出嫁公主的家长，且为天可汗之尊”，唐朝的本意是通过和亲措置，将吐蕃以藩臣身份纳入自己的天下秩序中。<sup>11</sup>金城公主的夫婿赤德祖赞，在公元730年致唐朝《请约和好书》《请修好表》中一再提及“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伏惟皇帝舅万福”（董诰《全唐文》），又表明吐蕃赞普一向承认从属关系。

回到昆伽阙可汗的例子，上文“只好立马承认了子婿关系，起受册命”的表述是不准确的，承认子婿关系是兼顾唐使现场所言“可汗奈何以子婿傲妇翁”，起受册命是依据此前唐肃宗已经“册命回纥可汗，曰英武威远昆伽阙可汗”。事实上，这是同一时间内进行了两个事项，或者说是在同一过程中完成的两项任务：先册命、后成亲，册命为主、成亲次之。而文成公主和亲的顺序正好相反：先成亲，后册命附马都尉，继而加封西海郡王等。而且这些册封活动都是唐太宗的儿子唐高宗所为。熊德基先生从政治角度出发，指出和亲、册封表达的含义是不同的，它们分别强调的是尊卑之别、君臣关系。<sup>12</sup>

不过，何耀华先生却将二者的关系统一起来。他认为“在政治上，松赞干布娶文成公主，一直以唐朝的‘子婿’自居，并称唐太宗为‘天子’，尽臣礼及‘子婿’之道”。<sup>13</sup>在政治上尽子婿之道的说法似乎不尽合理，但是在家天下的封建时代，唐蕃形成“‘叶同一家，社稷如一’的‘舅甥亲谊’”双重关系就合理的。<sup>14</sup>也就是说，行子婿之礼也能够表达君臣之仪的从属含义。还有一种解释，即唐蕃联姻——在政治意涵上表达的是臣属关系，而在个体之间则转换成实用、双方均认同的子婿关系、舅甥关系。这样也能帮助理解

---

11 林冠群：《唐蕃舅甥关系释义》，《中国藏学》2016年第2期。

12 熊德基：《唐代民族政策初探》，《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

13 何耀华：《论文成公主入藏》，《云南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

14 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侵害的一部分（史料选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3页。

法国藏学家石泰安先生所认为的舅甥也可能系指翁婿关系，<sup>15</sup>唯一不同的是翁婿关系在前、舅甥关系在后，或者说舅甥关系是由翁婿关系的发展而来。因此，王忠先生、胡戟先生等关于文成公主很可能是李道宗女儿的提论，应该有其道理所在，而不至于完全是空穴来风。

（四）假定文成公主是李道宗之女的讨论。如果文成公主确系李道宗之女，那么，史籍中为何没有文成公主身世的只言片语呢？最大的可能性，与文成公主的宗女身份有关。

首先，从宗室的牒谱传统看，其记载的主体是皇帝家族的男性成员。例如，《新唐书·宗室世系表》只记载了李唐四十一房诸王及其后裔中的男性（《新唐书·宗室世系表》），其中就包括了李道宗这一房系。但《李道宗列传》中并无文成公主的信息。

即使是宗室远亲中的男性，若为寂寂无名之辈，也同样着墨不多。例如李道宗之子李景恒，只是附在李道宗传后略写一二。由于李道宗素与朝臣长孙无忌、褚遂良不协，被二人借房遗爱谋反之事陷害，致使配流象州，在赴任途中病卒，英年五十四（后来长孙无忌、褚遂良获罪，李道宗才得以昭雪并诏复官爵）。可能受此影响，“配流象州。道病卒，年五十四。及无忌、遂良得罪，诏复其官爵。……。道宗子景恒，降封卢国公，官至相州刺史”（《旧唐书·列传第十》）。看起来李景恒并未袭封其父李道宗的王侯爵位，只做一名州级长官。总之，寥寥几笔，让世人知道了李道宗有一个儿子。

其次，对宗室远亲女性的记载，大概遵循了“只记事不记世”这一原则，即把这些女性的事迹散落于他人、他事的记载中，而不是专列于世家族谱之内。例如，李道宗有个女儿，是韦待价的妻子。新旧唐书《韦待价传》都明确记载了韦待价是江夏王道宗的女婿，因受李道宗在永徽年间被冤得罪，受到牵连，贬为卢龙府果毅，大概是从五品到正六品之间的一个武职。尽管韦待价曾经两次出任过唐朝宰相（文昌右相），为人十分低调，但说起

---

15 （法）石泰安著，耿升译：《圣神赞普考》，中央民族学院藏族研究所编：《藏族研究译文集（第二集）》，1983年12月，第1-18页。

他的曾孙——唐代著名诗人韦应物，以及韦应物女儿夫家兄弟的女儿是柳宗元的妻子这些关系（傅璇琮著《唐代诗人丛考》），更有助于理解唐朝宗室关系的复杂性。

再次，由于史籍中对郡主、县主等人记载的阙如，但随着这些宗室女的墓志被陆续发现，才使得人们能够了解到他们的身世，甚至一些公主鲜为人知的事情也能够在《公主列传》外得到补充。如此说来，文成公主的身世之谜最终揭开，有赖于文成公主墓志或相关墓志的发现。藏族民间传说，都有文成公主的墓在西藏琼结县藏王墓的说法（有说与松赞干布、赤尊公主合葬一处），不过从现有的吐蕃金石遗存看，吐蕃时期似乎还没有为墓室主人树碑立传的习惯，现有的吐蕃碑文都是后来所立。有一种可能是等到李道宗或与之有亲戚关系的人物墓志出土方能得解一二。

## 二、文成公主的选定

公主何以为公主？一般认为，公主是天生的，“自言富贵不可量，女为公主男为王”（唐·李颀《杂歌谣辞·郑樱桃歌》）。但为什么还要册封公主、为公主出嫁降旨呢？

（一）和亲公主册封的意义。法国藏学家戴密微先生在《吐蕃僧诤记》中对金城公主身份的讨论有一定的代表性，“守礼之女既非皇后所生，又非皇妃所生，当朝皇帝也从未抚养过，而又在此时此刻得到了‘公主’的称号，这一切都会使人想到，这种荣誉不是赐给她个人的，而是唐朝对藩属所使用的一种外交手腕”。<sup>16</sup>尽管金城公主从小未在宫中成长的说法与正史记载牴牾，但点透了册封公主的重要作用所在。唐中宗在送别金城公主时，对外坚称她是“朕之少女”，后来金城公主又以兄妹身份与唐玄宗往来书信等，都表明无论皇女、宗女，未经册封，仅为宫苑府邸里的公主（就如戴密微先生

---

16 （法）戴密微著，耿昇译：《吐蕃僧诤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第5页。

所说的储存品），对于皇帝及其家族来说，还只是血缘和亲属意义上的女儿，而不具有政治作用和社会意义。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一样，“藏族人民把她尊称为神，一方面反映了藏族人民对她的尊敬和爱戴，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在藏族人民心中，他们更看重的是由于文成公主的到来，促使他们在生产和生活中所发生的变化，更看重的是文成公主的社会意义，而不是文成公主本身”。<sup>17</sup>对于和亲公主，转换成政治意义上的公主，更是重中之重。

（二）先选定，后册封，这是和亲公主产生的一般规律。原因在于：和亲公主一般不是皇帝的亲姊妹或亲女儿，因而不具有天然性，需要事前拟定人选，然后加以册封，使之具有合法身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代国家的权力、形象和意旨，远适殊方，以期结好。问题是和亲公主是如何选定的呢？在历史中并无明文规定，原因是古人认为始终认为和亲并不是一种值得炫耀的事情。但是，按照“唐代所定公主降嫁之礼与百官庶民婚礼数大体相同，惟加册公主及公主受册而已”的情况。<sup>18</sup>因此，册封公主、和亲公主的册封，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由于和亲公主的特殊性，一些仪程可能被简略或者集中进行了，比如我们未见到有关文成公主册封的史料。金城公主两次册封，弘化公主不断加封等等都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此时唐朝正处于贞观盛世，想必文成公主的降嫁嘉礼定是衢闾相庆、歌舞长安，这一点也可以从后来拉萨欢迎文成公主的盛大场景中得到印证。

（三）和亲公主被选择的一种可能性参考。有一个观点：和亲公主原有身份，因家庭原因地位较低，是一种被动选择。在《吐蕃僧诤记》中，著者以金城公主为例，即认为金城公主之所以被选为和亲公主，“那正是由于她只不过是在宫廷里长大的皇帝的养女之缘故，也正是因为她的祖父从前曾犯

---

17 屈君等著：《中国文学：关于女性的叙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5月，第664页。

18 任爽著：《唐朝典章制度》序言，长春：吉林史出版社，2001年3月，无页。

过罪的原因”。<sup>19</sup>这种“父债女还”的解释，显然有牵强的成分，一方面显示出探讨这一问题的困匱，也反映了唐廷选择和亲公主的窘蹙。如果这种“父债女还”的原因还有一些解释力的话，那么套用在文成公主身上，就是李道宗曾在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以私事托于尚书右丞祖节（可能是他的手下）并获得唐太宗宴赐不少，被告发致“寻坐赃下狱”“遂免官，削封邑”《旧唐书·李道宗传》。也就是说，在假定文成公主是李道宗的女儿的前提下，由于她的父亲是带罪之身，因此被选定为和亲公主。如此推论下去，那么，李道宗后来官复原位，是不是也有文成公主的功劳呢？

### 三、文成公主的婚配年龄

较早应为民国时期的边疆学者任乃强先生提出文成公主的婚龄十余岁。任先生在《文成公主下嫁考》一文中指出：“史虽未著其寿，揣想亦不能过60岁。大约公主十余岁下嫁，50余龄薨。纵使其活至60岁，其下嫁时亦才22岁耳”。<sup>20</sup>任乃强先生在文中已经说明，主要依据是《西藏政教史鉴》所记得出年龄。但他给出了两个年龄时间：十余岁和22岁。

（一）关于文成公主出嫁年龄的其他研究结论。也有学者认为是十七岁、十八岁。比如国庆先生在著作中曾指出，“文成公主自17岁进藏，56岁去世（624-680年），在吐蕃生活了39年。松赞干布25岁时迎娶文成公主，34岁卒，和文成公主共同生活了9年”。<sup>21</sup>此论可视为探讨文成公主出嫁年龄的一种参考；沈卫荣先生则相当于肯定文成公主是十八岁入蕃和亲。他在论及文成公主的形象创造与汉藏文明交流的关系中说，“如果我们把文成公主（Mun change kung c[ɣ]lo, 623-680）——这一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放在同样的

---

19 （法）戴密微著，耿昇译：《吐蕃僧诤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第11-12页。

20 任乃强：《吐蕃丛考之十：文成主下嫁考》，《康导月刊》3卷第8、9期（1941年）。

21 曾国庆编著：《藏族历史·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6月，第30页。



镜头下来看，……”。<sup>22</sup>很明显，沈先生直接省去有关文成公主的讨论，明白无误地给出文成公主的出嫁年龄是十八岁（公元623—641年）。林梅村先生在2020年的撰文补阙中，也直接指明文成公主出嫁时的年龄是十五、六岁。<sup>23</sup>以上略举，可以看出学者们对文成公主的年龄（包括婚嫁年龄等）有多种论说。所以，既说明文成公主的年龄尚无定论，也说明还有进一步细究的可能。

（二）关于唐人的嫁娶年龄。唐朝典制中至少有两次法律性质的明文规定，不同的是两次颁文规定的婚龄上下限有变化。《唐会要》载公元627年（贞观元年），唐太宗诏令：“男年二十，女年十五已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早以婚媾，令其好合”；公元734年（开元二十二年），唐玄宗诏令：“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听婚嫁”。<sup>24</sup>说明唐代女性的法定结婚年龄，是在十三岁和十五岁之间浮动。这也符合唐人对女性生理的认识，《通典》载：“女子十四有为人母之道，四十九绝生育之理”。<sup>25</sup>以上都不出《孔子家礼》女子十五许嫁的适人之道。

事实也是如此，《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中有确切出嫁年龄的唐代女性，大多是在十五至十九岁之间，其中又以十五岁居多。能够保留下墓志者绝大多数为王公贵族和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也就是说，墓志反映的是唐代中上层社会的普遍情况。但是，“出嫁年龄最不正常的是皇室公主们”。<sup>26</sup>其婚姻受政治因素影响甚大，特别是安史之乱后，“国家多事，公主、郡县主多不以时嫁，有华发者”。<sup>27</sup>再进一步看唐朝公主的婚嫁年龄，有研究指出“唐代公主平均结婚年龄为18.55岁。其中，15岁以下的2名；

22 沈卫荣、侯浩然著：《文本与历史：藏传佛教历史叙事的形成和汉藏佛学研究的建构》，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5月，第98页。

23 林梅村：《相逢在青藏高原——敦煌古藏文〈松赞干布本纪〉残卷人物与葬地之一》，《敦煌研究》2020年第6期。

24 （宋）溥撰：《唐会要》，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6月，第1527、1529页。

25 （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12月，第1675页。

26 姚平著：《唐代妇女的生命历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4页。

27 《通鉴》226，建中元年十一月公主条。

15-20岁的10名；20-28岁的8名”。<sup>28</sup>但这里只有二十个样本，与唐朝共二百一十位公主相比，再按照和亲公主、唐高宗和唐太宗时代的和亲公主、伍非百先生所考《唐代公主与西北民族和婚表》等对照，<sup>29</sup>也同样较难得出代表性结论。但说明十五岁左右出嫁，仍然是个常用参数。

（三）关于藏族籍中所记文成公主的婚嫁年龄。与《西藏王臣记》《蒙古源流》所载也相接近。郭和卿先生所译1983年版《西藏王臣记》载：“又在中原都城中，复显出‘救度母’的化身文成公主，年届十六，容颜绝妙，具备美德，口出香气，犹如莲芳”；<sup>30</sup>刘立千先生所译1992年版《西藏王臣记》载：“又在唐都，救度母变化为化人公主，年方二八，容颜娟秀，美德具足，口出青色优钵罗花之香气”。<sup>31</sup>那么，到底是十五岁，还是十六岁呢？

这里有三点可以参考：一是藏族医学理论；二是藏族民间普遍认为，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即为一岁。有些藏区即使不以出生为计一岁，但仍然按照藏历十月二十五——西藏传统节日“燃灯节”为时间界限，确定属相。如今年是藏历金牛年，如果孩子是去年“燃灯节”以后出生的，即为属虎。但是，如果孩子是今年（藏历金牛年）大年初一之前出生，即便是藏历大年三十（除夕日）出生，也算一岁。据传这种风俗形成于吐蕃时期并流传至今，与汉地农历虚岁计算相似；三是藏族谚语有云“男上十五，计不问父；女上十五，食不乞母”“男大十五说话不靠父亲，女大十五吃喝不靠母亲”——意思是说十五岁的男女已经成年，可以自主。<sup>32</sup>藏族的这种纪年方式，实际上相当于汉地的十四岁。王沂暖先生也认为是十六岁，“文成公主与松赞干

28 郭海文：《唐代公主结婚年龄考——以墓志为中心》，西安碑林博物馆编：《碑林集刊（总第十九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86-200页。

29 伍非百：《唐代文成、金两公主下嫁吐蕃史迹》，《新亚细亚》1933年第6卷第6期。

30 五世达赖喇嘛著，郭和卿译：《西藏王臣》，北京：民族出版社，1983年7月，第24页。

31 五世达赖喇嘛著，刘立千译注：《西王臣记》，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年1月，第18页。

32 云丹龙珠、尕藏才旦辑译：《藏族谚语集（庆甘南藏族自治州成立三十周年丛书之四）》，甘南藏族自治州文联，1983年9月，第5页。

布结婚时，《蒙古源流》说是十六岁，这大概可信。贵族姑娘，结婚年龄不会太大。宏化公主（注：现在一般写作弘化公主）于文成公主前二年与吐谷浑诺曷钵结婚，据云是十六岁”。<sup>33</sup>今天的很多研究成果，大多采用藏汉史籍互参、以松赞干布年岁倒推等方式来厘定文成公主的相关年龄。

综上，文成公主在公元641年入蕃和亲的年龄，大致可以概定为周岁十五、虚岁十六。继而推之，文成公主的出生时间是在唐朝建立后的第八年，与唐太宗登基时间（公元626年）为同一年，次年（公元627年）改元贞观。

#### 四、唐廷送文成公主入蕃的仗仪

唐代公主出嫁称出降，仪礼称嘉礼，其程式繁复、持续时间长。《大唐开元礼》专辟有“公主降嫁”一节来规定，包括册公主、公主受册、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同牢、见舅姑、盥馈舅姑、婚会、妇人礼会、飧丈夫送者、飧妇人送者等共计十五个程序。每项仪程的时间，加起来大约要用十一二天（从内容看，亲迎和同牢、见舅姑和盥馈舅姑、婚会和妇人礼会似为同日举行）；每项仪程相隔的时间很难统一，所以《公主降嫁》多用“前一日”规定如何提前作准备，用“某日”“其日”表示时间不连续和仪程的间隔；仪程的地点也不同，有朝堂、主人大门、弥庙、舅姑寝门等。<sup>34</sup>其中，纳问期迎等六礼既是遵循《周礼》，也符合《唐律》“一准乎礼”的要求。

（一）文成公主长安送别的地方。廖东凡先生在《拉萨掌故》中说文成公主出嫁时，“父皇母亲亲自送行，依依不舍地一直送到长安城外的柳桥，才挥泪告别”。<sup>35</sup>

33 王沂暖：《松赞干布的生年卒年与享年》，《西北民族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1期。

34 （唐）中敕撰：《大唐开元礼》，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5月，第546-556页。

35 廖东凡著：《拉萨掌故》，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5月，64页。

“柳桥”之名称，初检唐人送别情况未见此地，但唐人确有岸桥折柳相送的习俗。对此，唐诗中有大量记载，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就是其中的代表作。该诗还给我们两点重要提示：渭城和西出。渭城即咸阳，《汉书·地理志》中即有“渭城，故咸阳”的记载，<sup>36</sup>唐《括地志》也说“咸阳故城，亦名渭城”。<sup>37</sup>咸阳在长安之西北，属京畿之地。从长安西出，必渡渭河、经咸阳。渭河上自古就西渭、中渭、东渭三座桥，其中的西渭桥又称便桥、便门桥。《三辅黄图》载出长安城往西北的“便门桥，武帝建元三年初作此桥，在便门外，跨渭水，通茂陵（长安城西门曰便门，此桥与门对直，因号便桥）”。<sup>38</sup>唐代的便桥和汉代的便桥，即西渭桥都在一个地方，安史之乱时唐玄宗奔蜀、唐肃宗送其女宁国公主出嫁回纥也是渡便桥而至咸阳，<sup>39</sup>金城公主入蕃和亲的送别地——金城县凤池乡枪别里，也在今天咸阳市的兴平县。

综上“柳”“桥”等信息，大概能将唐太宗送别文成公主的地方厘定在咸阳附近的西渭桥。今天的陕西省咸阳市仍然保有渭城区，而西藏的第一所现代高等学府——创办于西藏民主改革前夕的1958年的西藏民族大学，即在渭城区的文汇路上，不得不说这是自文成公主入藏后吐蕃子弟入国子监学习历史的神奇感应。

（二）文成公主的送婚队伍。史书只载送婚主使李道宗在青海河源交接的情况，其后李道宗是否到达目的地逻些（拉萨）则未置一字。所以，顾吉辰先生曾指出，新旧《唐书·李道宗传》均“失载其出使吐蕃一事”。<sup>40</sup>

事实上，李道宗并未到达吐蕃王都逻些（今拉萨），而是中道折返。但

---

36 （汉）班固撰：《汉书（第六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154页。

37 （唐）李泰等著，贺次君辑校：《括地志辑校》，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2月，第18页。

38 陈直校证：《三辅黄图校证》，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第140页。

39 李之勤：《“沙河古桥”为汉唐西渭桥说质疑——读〈西渭桥地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3期；辛德勇：《隋唐时期长安附近的陆路交通——汉长安交通地理研究之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4期。

40 顾吉辰：《唐代入蕃使者李道宗事迹编年》，《西藏研究》1991年第4期。

是，此时从青海的“鄯城至逻些共三千七百七十里”，<sup>41</sup>行程之远且路途更为艰险，嫁奁之多加上队伍庞大，没有一位精干的送婚副使，或者相当于履行副使职责的人来操调，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从吐蕃方面看，吐蕃大相禄东赞是迎婚主使，大臣之一的支·塞汝贡敦是副使（此人《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也有记载）；吴逢箴先生还指出“跟随禄东赞到长安（迎亲）的还有吐蕃著名学者吞米桑布扎，他学识渊博，传说他受命创制藏文。松赞干布派这样一位智囊人物跟随禄东赞来长安，可保在礼仪方面万无一失，由此可见松赞干布对这次请婚之行的精心安排”；<sup>42</sup>此前，禄东赞到尼泊尔为主求婚时，吞米桑布扎担任翻译，其履行的显然也是副使职责。

从唐朝方面看，在文成公主和亲吐蕃的前一年，唐朝已将弘化公主嫁与吐谷浑，并派有主、副使护送且资送甚厚。《新唐书·淮阳王（李）道明》载“贞观十四年，与武卫将军慕容宝节送弘化公主于吐谷浑”，<sup>43</sup>慕容宝节即为副使；文成公主在藏四十年、薨逝三十年后，唐朝派遣左骁卫大将军杨矩为主婚使护送金城公主入蕃和亲，随行副使是御史大夫郑惟忠，宋代《唐诗纪事》载“金城公主和蕃，中宗送至马嵬，群臣赋诗。帝命御史大夫郑惟忠及（周）利用护送入蕃，学士赋诗以饯，徐彦伯为之序云”，<sup>44</sup>显然郑惟忠是副使，周利用是判官一类的送婚官员，因为按照唐朝的使节制度，“唐朝向边疆民族地区派遣的使者队伍一般由正使、副使、判官等组成”，<sup>45</sup>有副使同行是为常制。因此，号为“天可汗”的唐太宗，仅不失威仪一条，就会派出副使送婚。据上而论，唐朝派出入蕃副使始于文成公主入蕃和亲之时，而且从李道宗时任礼部尚书的情况看，护送文成公主的副使应首推礼部官员。

41 王忠著：《新唐书吐蕃传笺证》，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9月，第6页。

42 吴逢箴：《论构成唐蕃友好关系的四个因素》，《中国藏学》1998年第3期。

43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第十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2月，第3519页。

44 （宋）计有功撰：《唐诗纪事》卷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11月，第180页。

45 李大龙著：《唐朝和边疆民族使者往来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05页。

## 五、吐蕃迎接文成公主的情况

汉文史籍中，松赞干布亲临河源迎亲这一点，是有关文成公主事迹记载中着墨最多、最为称道的地方。与之相反，藏族史籍则没有松赞干布河源迎亲的事迹记载，只有迎亲的宏大场面描述。例如，《柱间史》的记载：“（文成公主）临近吐蕃之时，吐蕃赞普乃遣使臣往迎，且将举行喜宴。松赞干布说道‘她乃度母化身之公主，因此变幻巨大，她将自何方到此不得而知’。言罢宣布要四面出迎”。显然，要做如此之多的准备工作，动员起来也所需时日，恐怕不亚于唐朝方面的送婚靡费。其他更具体的细节，可以从吐蕃古代婚姻专著《择偶七善业轨仪》中得到表现。该著作实际上是一本按照苯教关于婚姻仪式、程序、颂词、礼节的规矩的书写，包括八个部分：请神灵来至新娘身边驱魔、洗去污秽不洁不祥、为新娘铺设地毯并迎进家门、献给新娘三种奶制品（三白）、为新娘取一新名、招福、颂祝吉祥。这些程式实际包括两大内容：求神保护与驱魔祛秽、赞颂两性结合与创造新生命的神圣庄严。<sup>46</sup>似乎是说松赞干布是在拉萨迎接的文成公主，该书也确实记载了拉萨盛大的欢迎场景，所以给人们一种拉萨迎亲的印象。特别是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被发现并公之于世后，其中关于“赞蒙文成公主由噶尔东赞域宋迎至吐蕃之地”的记载，以及唐史中明确记载是禄东赞到长安接亲的史实等，也险些落定松赞干布未曾到过河源迎亲这一猜测。

（一）汉藏史料中所记载松赞干布河源迎亲的出入，以及文成公主到达拉萨的时间差等，由此引出众多关于文成公主与禄东赞的故事，特别是关于文成公主滞留途中生子，因而到达拉萨耗时三年的谣传。即使藏族民间有这样的传说，但是上升到艺术作品的描述，也应当慎之又慎，因为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表达时空，其性质和影响也会发生完全不同变化和效果，更何况历史文献中无一着笔。当然，这也可能是人们希望文成公主有子嗣的善意表

---

46 （英）桑木旦·G·噶尔梅著，向红笳译：《概述苯教的历史及教义》，张植荣主编：《国外藏学研究译集（第十一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年4月，第61-130页。

达，因为这种善意后来又延续到了金城公主，如藏族传说事故“二母争子”。对此，石硕教授作过深入的研究，结论是金城公主在吐蕃很可能生有一子，但此子非赤松德赞，而应是先于赤松德赞出生的拉本王子。<sup>47</sup>不过，到目前为止，无论藏汉史籍还是民间传说，都表明文成公主没有留下亲生的孩子，她把大爱留给了吐蕃人民，可以说每个藏族同胞都是她的孩子。

以上种种揣测，其中心的论点是文成公主在藏是否生子、生父是谁的问题，其根本的指向是：企图在形象上抹黑文成公主的形象，从而指摘文成公主的品行，接着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否定唐蕃友好关系。这是不可接受和令人担忧的倾向。这种按照汉地道德标准来评判的潜台词，大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意味，更别说完全没有考虑当时吐蕃的婚俗惯习。事实上，阿底峡尊者早已在《柱间史》中予以了严厉驳斥和充分澄清。尊者指出，“有些六根不净之徒诬陷说，后世吐蕃之地妇道日渐衰微，其端倪始于文成公主，说文成公主曾与大臣噶尔私通，她有入蕃途中身怀六甲，自知没脸尽早去见赞普，故在胎儿足月降生之前，只好在途中耽延时日。然而，在诸佛与众菩萨的眼中，呈现的则是世尊亲临雪域吐蕃的吉祥象”。<sup>48</sup>《贤者喜宴》也同样指出这是不良大臣的谎言。况且也与禄东赞极力为难初到逻些时的文成公主的相关记载极不相符。张云教授应是较早看出了其中的玄妙，也是第一位纠正文成公主与禄东赞之间关系种种谬说的学者。他指出，佛苯之争是产生这种恶意指毁文成公主的根因，产生的时间是后世而非当时，文成公主与禄东赞、赤尊公主以及迎婚大臣之间的矛盾等为流言提供了空间等，“不仅噶尔与文成公主大多（时候）不同行，而且曾怀有芥蒂”。<sup>49</sup>尽管张云先生未加详明芥蒂为何，但在藏族史籍确有意强调禄东赞在长安迎亲时受到唐王非难，被扣留后又好不容易出逃并追赶上出嫁队伍，也许有这个原因，在文

---

47 石硕：《金城公主事迹中个别疑案的研究——关于金城公主在吐蕃否生子问题的考证》，《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48（印度）阿底峡尊者发掘，卢亚军译注：《西藏的观世音》，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第83-184页。

49 张云：《藏文史籍〈柱间史〉有关西藏社会史的若干记载及辨正》，《中国藏学》2013年第S1期。

成公主一行到达逻些后，禄东赞不提供给养、不让见松赞干布等，并托辞暗示是赤尊公主从中作梗，导致文成公主一行无以为继，只好提出要返回长安才得以解决（也许还有吐蕃方面有意考验以期其适应新环境的因素，对此后文将有所讨论）。

（二）禄东赞作为松赞干布的重臣，要陪同文成公主走三年，也是极其不合情理。根据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的记载，吐蕃用了三年时间左右征服象雄，“此后三年，墀松赞赞普之世，灭李聂秀，将一切象雄部落收于治下，列为编氓。此后六年，墀松赞赞普升遐，……”。<sup>50</sup>墀松赞即松赞干布，逝世于公元649年，因此象雄被征服的时间是他在世的倒数第六年，即公元643年。乌瑞先生认为是“通过644-645年间吞并象雄王国，吐蕃上部地区的大部分领土直接落入了吐蕃政权”，<sup>51</sup>比《大事纪年》所记晚了一到两年。是不是有这种可能：象雄在公元643年被初次打败，直到公元645年才被完全灭亡？同书《赞普传记（八）》记载了吐蕃征服象雄后君臣欢宴作歌的场景。松赞干布在唱词中十分明确地表达了征服象雄的第一功臣是禄东赞，而且只点名褒扬禄东赞一人。赞普歌云“噫嘻！若问赞普是何名？乃我墀松赞是也。这位大臣是何名？乃东赞域宋是也，……”。<sup>52</sup>以军功论赏的松赞干布时代，公开赞颂大臣禄东赞，表明禄东赞此时已经跃升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之位。接前文所述，征服象雄用了三年，最大的功臣是禄东赞。英国藏学家邓伍德先生通过研究拉达克地区遗存在山岩上的吐蕃时期石刻，并对比同期象雄、于阗甚至敦煌的文献等后，得出结论：“彼时，拉达克正在象雄王国的辖下，由吐蕃大臣噶东赞·玉松指挥的战役的结果是：象

---

50 王尧、陈践译著：《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2月，第145页。

51 （匈牙利）乌瑞著，肖更译：《吐蕃编史辨析》，王尧主编：《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二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第5-67页。

52 王尧、陈践译著：《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2月，第168页。



雄王国成为吐蕃王朝的属地”。<sup>53</sup>因此，要禄东赞在东西跨度达2000多公里的青藏高原上来来回回——既要在东边陪同文成公主赶路，又要在西边协助松赞干布激战象雄，显然是天方夜谭。也就是说，极可能禄东赞只是在名义上陪同，实质上驻境吐谷浑。

（三）禄东赞的后人被赞普降罪受诛，再倒推到禄东赞身上就有不忠的谱系。比如，张云先生较早对“吐蕃七贤臣”事迹进行考辨，尽管“前三位属于吐蕃早期历史中的人物，尤其是前两位，与神话时代相衔接，大有难辨真伪之嫌。后四位则生活在吐蕃王朝时期，也即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其可信程度要高得多”。<sup>54</sup>但是，作为吐蕃史上赫赫有名的禄东赞，却不在吐蕃七大贤臣之列（而新旧《唐书》对他的叙述及评论“相当详细”“别的（吐蕃）大臣都没有受到这样的重视”，<sup>55</sup>也不乏大赞之词），相反与他同时期的吞米·桑布扎却赫然在列。这个差别，如果说禄东赞没有给吐蕃人留下好印象是片面的，因为禄东赞辅佐两任赞普，功勋卓著，禄东赞去世时“赞普芒松芒赞十分悲痛，因为他失去了一位睿智忠勇的大相，吐蕃人民也失去了一位好儿子”，<sup>56</sup>这应该是当时的实情。禄东赞以忠诚于赞普起家，为吐蕃王朝的强盛做出了立有大功。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闻呢？至少有两种最大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是互为连贯的。禄东赞对于吐蕃佛教的发展，可能并未做出与大相职位相称的贡献（这一点在汉藏史籍中都找不到相关材料，说明他信奉苯教也不是不可能的），再加上他的儿子叛蕃反蕃（也很可能被认为是破坏佛教正统的大逆行为），因此以僧侣为主体的个别史家就很有可能“想象”出了这样的故事，同时也增加了枯卷的可读性，为民间发挥提供了源泉。

---

53 （英）邓伍德著，陈楠译：《拉达克石刻录》，王尧主编：《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二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第13-149页。

54 张云：《“吐蕃七贤臣”考论》，《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

55 （美）李方桂：《吐蕃大相禄东赞考》，《西藏研究》1985年第2期。

56 德吉措姆著：《流尚的吉曲河：学历史讲拉萨》，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20年8月，第58页。

这个怀疑是有旁证的，匈牙利的藏学家乌瑞先生在对比研究《贤者喜宴》和《王统纪事》中有关“法规与组织的纪事”的深刻相似性后，指出“在‘纪事’中通过把噶尔制定法律归功于君主他自己这种做法（写法），加大国王的作用，贬低噶尔的作用。这个由可信的资料，也是民间故事的主题编成的有关行政组织的故事，也有贬低噶尔所起作用的目的：噶尔不能胜任他的工作，故首先利用小孩的帮助，最后又从一个牧人处学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可以说“‘纪事’的原型是按照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反抗噶尔的霸权和王室努力限制大相权力的精神，大约在715/718年写成的，而且有些部分是根据国王母亲氏族——琛氏家族的利益写的”。<sup>57</sup>

## 六、吐蕃河源迎亲的原因

前一小节主要驳斥了有关文成公主与禄东赞之间演绎的故事。汉文史籍关于松赞干布河源迎亲的记载十分明确。如《旧唐书》载：“弄赞率其部兵次柏海，亲迎于河源。见道宗，执子婿之礼甚恭。既而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及与公主归国，……”。但是，汉藏史籍中关于松赞干布河源迎亲，还是拉萨迎亲的问题，其本质是二者在时间和空间上无法离合，也加剧了对唐史记载的质疑。

（一）直到2014年，陈庆英先生发表《关于松赞干布河源迎亲》一文，终于有了令人信服的答案。陈庆英先生首先完整解读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所记情况：赞普墀松赞巡临北方，吐谷浑与汉属之……，……与吐谷浑二地纳赋。赞普松赞与王弟赞松失睦，王弟……恼怒；王弟赞松驻于“年”之“森”。……赞蒙文成公主由噶尔东赞域宋迎至吐蕃之地，……。然后将前后文意联系起来阐发，指出“这些文字说明，就在松赞干布在河源一带迎接文成公主之时，吐蕃内部发生了松赞干布和他的弟弟的矛

---

57（匈牙利）乌瑞著，王青山译：《〈贤者喜宴〉分析研究》，陈庆英、沛·晋美编辑：《藏族研究译文集（第一集）》，中央民族学院藏族研究所，1983年3月，第106-125页。

盾，导致王弟赞松从拉萨出走。赞普兄弟的失和，当然不仅是他们个人之间的恩怨，很可能是两派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威胁到新兴的王朝的安危，这就造成松赞干布在河源会见李道宗和文成公主一行后，即需要返回拉萨处理急务的局面。在这种情形下，松赞干布不能和文成公主的送亲的大队人马缓行至拉萨，故而自己先行间道返回，而命噶尔·东赞域宋陪同公主一行至拉萨”。<sup>58</sup>赞普兄弟阅墙，在敦煌吐蕃文献出土之前，唯有《弟吾教法源流》曾予记载。松赞干布“其弟蔡邦察尤者，置于聂地，故死于麦止，降为塘参”。塘参（thang-mtshams），其位阶在赞普与尚论之间，即赞普之下、尚论之上，但其职权几何尚不得而知，是否类似于唐朝有名无实、还乡养老的勋爵名号还有待考证。不过从被降为塘参的情况看，大多数与赞普有隙或者说对王权有碍，极少数为新赞普继位、老赞普之兄弟即叔伯被改封，因此不可能给予多大的实权和封赐。当然，被记录在案，也确证了兹事体大。陈庆英先生这一考论，不但解释清楚了松赞干布、文成公主没有一同前往拉萨的原因，而且还暗示了李道宗中道而返的原因——很可能是被吐蕃婉拒了。

（二）这一点，还可以从唐蕃松州之争中找到一些有力的证据。唐书记载，松赞干布率众二十万屯于松州，唐军步骑五万迎击。吐蕃军队被唐军夜袭且斩杀千余人后，突然单方面撤兵。单从二十万对五万、斩杀千人等数量的对比看，事情就显得十分蹊跷。王忠先生对此较早提出了质疑，郑铁钜先生进一步进行了解析。他说“这是唐蕃双方第一次军事冲突，也是松赞干布一生中唐采取军事行动的唯一的一次。松赞干布迅速撤军西归，并不意味着它在军事上的失利。因为此役双方力量对比，唐军并不占优势，且在短暂的交兵中互有胜负。对松赞干撤军返国的原因，一般学者认为，吐蕃内部由于多年对外用兵，呈现不安现象，加之国内新丧（监国王子贡松贡赞之死），恐生变故，并以‘八大臣尸谏’事为据。其实不然，真正使松赞干布撤兵的原因，是他的对唐亲善政策。所以，他在退后途中，继续遣使向唐请婚，表

---

58 陈庆英：《关于松赞干布河源迎亲》，《中国藏学》2014年第4期。

示对唐友好”。<sup>59</sup>还有一个其实不然，即《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所记“赞普松赞与王弟赞松失睦”，王弟赞松出走（就有可能作乱）、王子贡松贡赞丧亡（就有可能引发内乱）两个事件叠加，才是更接近松赞干布撤兵的真实原因。如果说唐蕃在松州之争中打了个平手，这对于英武盛年、无往不胜的松赞干布来说就是出师不利、就是败绩。“八大臣尸谏”事件的出现，也证明了松赞干布罢兵的迟疑和不甘。这种边开战边联姻的策略，在后来吐蕃征服象雄时也使用过。敦煌藏文卷子 P.T.1287 记载：“此王（指松赞干布）之时，与象雄王子方面联姻结好，一方面又公开交兵征战，赞蒙赛玛噶往象雄作李迷夏之王妃”。<sup>60</sup>但二者又有不同：打象雄，是征服是据为己有，也有恢复其父朗日松赞时期的“盟主”地位的意思；攻松州，是试探唐朝，也有威胁吐谷浑的作用。因此，所谓松赞干布退兵请罪，又以请婚方式向唐示好，目的在于稳住唐朝，防止趁虚而入，同时借以脱身，迅速返程妥善处理善后。

（三）吐蕃既不愿意暴露内政不稳的秘密，更不愿意唐朝方面侦知自己的行军路线。这一点，在后来的长庆会盟中，专门就使节往来路线作出协定可以印证。李方桂先生指出，此次会盟不仅重申了姻亲，“还规定了使臣往来于唐朝和吐蕃之间的道路（见西面第40-46行）。这条协议的道路显然是从吐蕃境内的清水县超过陇山关口，进而到达唐朝境内的陇州。这是一条现在还在继续使用的通道……，这些地方肯定是位于著名的陇山关以西的边境村落或要塞”。<sup>61</sup>2004年有文章声称，在四川阿坝的九寨沟县甘海子风景区和神仙池风景，发现了一条连接两地的神秘马道，“它就是历史上松赞干布

---

59 郑铁钜：《松赞干布时期唐蕃使者交往辑述》，《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

60 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2月，第165页。

61 （美）李方桂著，吴玉贵译：《唐蕃会盟碑（82-822年）考释》，耿升主编：《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八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第1-96页。

亲自率领吐蕃大军进攻唐朝的秘密栈道，即松赞干布马道”。<sup>62</sup>这种神秘马道应该不止一条，否则唐蕃松州之围时，声称有十万之众的吐蕃大军就无法在山高林密的川西高原集结和展开。又如，马未都先生在《观复嘟嘟》一书中讲到一个福建的传说：文成公主在进藏途中不断问路的情况，“当年文成公主一路走一路问，说这是哪儿啊？这个翻译不给译，怕迎接公主的特使不高兴，特使问，文成公主说什么了？那翻译就说，她祝你们吉祥如意”。<sup>63</sup>公主问路，迎接特使理当恭敬且如实回答，岂敢不高兴？！这个传说反映出文成公主好奇问路的理由不足，而吐蕃严防泄密的情况明显。

## 七、文成公主在藏生活的年限

一般认为，文成公主在藏生活了四十年，这一点已为史家所公认。此与《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的文成公主实际在藏时间少了一年。

（一）文成公主在藏生活时间的讨论。如果按照公元640年吐蕃迎亲团到达长安，时间仍然是四十年；如果按照公元638年或639年，唐朝正式允婚（相当于订婚，可以视为夫家人），那么就多出两到三年时间，是四十二、三年，与《白史》所说的四十二年一致，“赞普去世之后，公主在藏生活三十一年。总合公主在藏四十二年”；<sup>64</sup>《汉藏史集》又说“汉妃（文成公主）阴铁牛年（辛丑，公元641年）由汉地来吐蕃，在吐蕃地方住了五十八年”。<sup>65</sup>这个时间更接近文成公主的实际年龄，或许藏族人民心中的文成公主，天生就是雪域的菩萨。

可以看出，文成公主在藏的时间，是以公元641年松赞干布河源迎亲作

---

62 周汉忠：《松赞干布马道 湮没千年足迹》，《西藏科技报》2004年11月。

63 马未都著：《观复嘟嘟（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8月，第117页。

64 根敦群培著，法尊法师译：《白史》，兰州：西北民族学院研究所，1981年10月，第59页。

65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02页。

为时间和地理起点起算的。不过，此时此地还属于吐谷浑。史载吐蕃于公元663年完全征服吐谷浑，但唐廷直到“清水会盟”时的赤岭划界，才以官方形式予以承认。只不过似有很大的可能在公元641年之前，吐谷浑已为吐蕃实际控制，或者控制了很大一部分，否则松赞干布也不太可能率领大部队，越界到吐谷浑境内迎亲)。如同下面的讨论，文成公主到达拉萨的时间——也可以说是文成公主在入蕃路途耗费的时间，更是含混不清。

(二) 文成公主到达拉萨时间的讨论。在陈育宁先生誉为第一部系统论述中国民族关系史的著作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一书中，<sup>66</sup>主编翁独健先生认为松赞干布先是到和源地方亲自迎接文成公主，“然后同返逻些城。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文成公主一行抵达吉雪卧塘，吐蕃人民闻讯欢歌庆祝”。<sup>67</sup>不过，因体例原因，书中未能叙述这个时间的来源。但就我们所见，早于该书八年出版的《西藏风土志》可能对此曾有过参考作用。该书曰：“经过两年多的长途跋涉，公主终于在公元六四三年安全到达吉雪卧塘”。<sup>68</sup>“吉雪卧塘”就是今天的大昭寺所在地这一区域，也可以泛指逻些（今拉萨）。有民间说法是“先有大昭寺，后有拉萨城”。因寺而市，在早期的城市发展中是常见的，比如北京也有类似说法，“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西藏风土志》书中明确文成公主到达拉萨的时间是公元643年。《西藏风土志》的作者赤列曲扎先生在后记中，专门致谢了藏族学者才旦夏茸先生、恰白·次旦平措先生的精心指导，说明三位大学者是赞同三年期这一时间的。

(三) 文成公主路途用时的讨论。才旦夏茸先生曾在《关于藏族历史纪年的几点意见》一文中，否定过敦煌古藏文文献中关于文成公主入蕃用时十年之说，以及肯定《青史》否定《白史》中与之相关问题。如“敦煌文

---

66 陈育宁著：《民族史学概论》（增订本），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第181-195页。

67 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327-328页。

68 赤烈曲扎著：《西藏风土志》，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10月，第272页。

献首尾残缺不全，松赞何时降生、文成公主何时入藏都不清楚。但是说大臣鲁东赞（禄东赞）迎娶公主沿途逗留十年，公主与松赞（松赞干布）会面三年后，松赞卒”“假如果真如此，那么文成公主在入藏途中竟需十年光景吗”“所以，文成公主在途中逗留十年的说法是不应当轻信的”。在汉译本《青史》“松赞王起至朗达玛王之间的概况”部分中，没有看到有关文成公主途中迟滞十年的记载；文中又载，“辛丑年文成公主远嫁，那时松赞七十二岁，途中逗留六年，松赞七十九岁与公主结合，这种武断的说法毫无根据，《青史》的作者）廓译师的前一个六十年己丑年生是不错的”“《白史》上部说，汉公主入藏之年为释迦圆寂后1188年（甲辰年），在下部中又说释迦圆寂后1185年（辛丑年），前后相差四年，自相矛盾”。可以看出，才旦夏茸先生已经敏锐地发现了问题，也深入地分析了问题，并且在另一篇文章中同样肯定了《青史》关于松赞干布降生于公元629年的判断正确，又特别指出《白史》对此“恣意挑剔廓译师把纪年整整搞错了六十年，是毫无道理的”。<sup>69</sup>但两文在文成公主进藏途中耗时几年这一问题上，终未能给出答案。

恰白·次旦平措先生在《大昭寺史事述略》中只记为“于公元七世纪中叶，由藏族人民为主体建成的”，<sup>70</sup>没有具体的年份。关于松赞干布是否与文成公主同返拉萨一事先按下不论（此与《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所记大相禄东赞迎至蕃地、与松赞干布二人最后同居三年、等记载不符），仅看文成公主一行“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即经过两年多、三年才到达拉萨的情况。如果在时间上成立，那么与唐朝使臣入蕃，一般“从长安到逻些，往返需要7、8个月的时间”相差甚远，<sup>71</sup>少则也要半年左右。而且，这个行程的时间，直到清代都没有什么大改变。例如清朝最后一任驻藏大臣联豫于公元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以帮办大臣的身份，于当年“十一月由成都起程，于次年七月抵达拉萨”（直到公元1906年原驻藏大臣有泰因抗英不

69 才旦夏茸著，王任邦翻译整理：《正法年代学之研究》，《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2期。

70 恰白·次旦平措执笔，陈乃曲扎、陶长松译：《大昭寺史事述略》，《西藏研究》1981年创刊号。

71 严寅春：《崔河图使蕃考》，《西藏研究》2005年第2期。

力等原因被劾革职后，才接任驻藏大臣兼帮办大臣)。可见从唐朝到清朝的一千多年时间里，直到民国时期才开通了海路。尽管二者南北方位不同，分别是唐蕃古道（接近今天所说的青藏线）和茶马古道（和今天所说的川藏线近似），但看起来在正常情况下两线所费时间大体一致。因此，出嫁到逝世，文成公主在吐蕃生活的时间至少在四十年以上。

文成公主到达吐蕃后，就开始了传播中原文化、引入生产技术、兴盛佛教事业等等，“为唐朝和吐蕃之间的友好交流搭起了一座桥梁，并深刻地影响到两地百姓的生产生活。吐蕃与唐朝之间的朝贡贸易由此获得长足的发展，也使吐蕃有机会参与当时繁荣的国际丝路文化交流”，至今西藏民间故事和传说中还把许多西藏地区的发明创造归功于文成公主，实际上表达了藏族人民对文成公主的热爱和怀念，“把她看作是给吐蕃带来巨大影响的中原代表或唐文化的象征”。<sup>72</sup>文成公主被藏族人民世代尊奉为绿度母，至今在拉萨的布达拉宫、大昭寺等名胜之地都有供像，正是藏族人民对她的怀念的一种朴素表达。

本文仅就文成公主的有关基本身世、年龄、婚嫁等进行了初步探讨，在很多问题上还没有作出深入的挖掘，也肯定存在许多不足甚至错漏，敬请大家批评指正，以励后进。

---

72 张云、林冠群主编：《西藏通史·吐蕃卷（上）》，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年4月，第25、26页。